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1.04.004

女登与女登文化的考察

——兼谈女登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霍彦儒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宝鸡分院, 陕西 宝鸡 721000)

摘要: 女登是炎帝之母。女登是人而不是神,与神话人物九天玄女无涉。女登是位传说性的历史人物,她生活于距今七千年前后的前仰韶文化与仰韶文化的交替之际。有蟠氏族一女子,与少典氏族一男子通婚而生下炎帝。文献传说,女登“感神龙首”而生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女始祖;民间传说,她发明了蜂业,为中华“蜂业之祖”,还发明了草鞋、蓑衣、围裙等物质文化。炎帝“寻母”“抬母”的传说故事,体现了炎帝的孝道精神;女登所创造的女登文化成为姜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女登祭祀中的排灯会、抬社火等民俗文化与女登、炎帝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开发和利用女登文化这一独特文化资源,对提升农民精神素质,塑造村容村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高乡村社会文明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女登; 炎帝; 养蜂; 女登文化; 蜂业之祖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1)04-0025-10

引用格式: 霍彦儒. 女登与女登文化的考察: 兼谈女登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6(4): 25-34.

Investigation of Nü Deng and Nü Deng Culture: Also on th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ü Deng Culture

HUO Yanru

(Baoji Branch of 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aoji Shaanxi 721000, China)

Abstract: Nü Deng is the mother of Emperor Yan. Nü Deng is a human, not a god,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ythical figure Jiutian Xuannü. Nü Deng is a legendary historical figure. She lived at the transition of Qianyangshao culture and Yangshao culture around 7 000 years ago. She lives in the Yan clan, who intermarried with a man from the Shaodian clan and gave birth to Emperor Yan. According to legend, Nü Deng “felt the dragon head” and gave birth to Emperor Yan, so she is regarded as the female ancestor of the Chinese nation. According to folklore, she invented the apiculture, as well as straw sandals, straw rain cape, aprons, etc. The legendary stories of Emperor Yan “seeking his mother” and “carrying his mother” embody the spirit of filial piety of Emperor Yan; the Nü Deng culture created by Nü De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Jiang Yan culture; the folk customs such as “the lantern show” and “carrying Shehuo”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Nü Deng and Emperor

收稿日期: 2021-05-05

作者简介: 霍彦儒(1947—), 男, 陕西扶风人,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宝鸡分院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华炎黄文化和中国先秦史。

Ya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unique cultural resource of Nüdong cultur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spiritual quality of farmers, shaping the appearance of the village, cultivating civilized rural customs, good family customs, and simple folk customs,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ural soci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Nüdong; Emperor Yan; beekeeping; Nüdong culture; ancestor of apiculture

在中华文明的开创和发展中,不能没有女性的参与;女性和男性一样,为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后,由于世系是以男性计算的,男性处于社会和权力的中心地位,女性地位相应地降低了,失去了政治上的支配权,因此,人们在追溯始祖时,往往只追溯至男性始祖,在传世文献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记载男性在经济、社会中的功绩和作用,如将农业的发明记载在炎帝神农氏等人物的名下,将衣食住行的发明记载在黄帝轩辕氏的名下,等等。不过,在一些文献传说和民间传说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杰出女始祖的“名字”,如华胥氏、女娲、嫫祖、姜嫄等等。与男性记载比较起来,尽管有关这些女性的史料很少,但从这些有限的史料里,我们可以窥见其事迹“素地”。

本文主要研究中华女始祖女登与女登文化。笔者希望通过对女登和女登文化从文献、传说、民俗以及考古学文化等方面的考察,一是还原女登的本来面目,即她是一位传说性历史人物,而不是神话人物。二是发掘和阐释女登文化的内涵及精神、意义。三是通过对女登与女登文化的考察,进而认识中华原始女性在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在中华民族的早期孕育、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四是证明女登与女登文化是对炎帝与炎帝文化研究的补充和丰富。文献传说炎帝“以姜水成”“崩葬长沙”,在这些地方留下了大量的传说性炎帝遗迹和炎帝文化,所以研究炎帝与炎帝文化也离不开对女登与女登文化的研究。五是通过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开发和利用女登文化中于今天有用的资源,古为今用,以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明素质,促进和振兴当地经济、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的开发、建设和发展。

一 女登的考察

女登是一位新石器时代中期传说性的女性历史人物,属于有蟠氏族。民间传说她生活于宝鸡秦岭北麓一带,以养蜂为业,为中华养蜂第一人,被誉为中华“蜂业之祖”。

(一) 女登是人(传说人物)而不是神(神话人物)

关于传说人物与神话人物的区别,著名作家茅盾先生说:

传说(legend)也常被混为神话。实则神话自神话,传说自传说,二者绝非一物。神话所叙者,是神或半神的超人所行之事;传说所叙述者,则为以民族的古代英雄(往往即为此一民族的祖先或最古的帝王)所行之事。原始人对于自然现象如风雷昼暝之类,又惊异,又畏惧,以为冥冥之中必有人(神)为之主宰,于是就造作了一段故事(神话)以为解释;所以其性质颇像宗教记载。但传说则不然。传说内的民族英雄,自然也是编造出来的,同神话里的神一样,可是在原始人的眼中,这些英雄是他们的祖宗,或开国帝皇,而不是主宰自然现象的神。所以传说的性质颇像史传。这便是神话与传说的区别^[1]。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说:

首先要明确传说与神话的区别。疑古派把三皇五帝都看作神话,认为尧舜禹都是神话人物,认为尧舜禹本来都是天神,后来转化为人王,炎帝黄帝就更是天神的称号了。事实上,这种看法不过是想当然耳。传说与神话是有区别的。神话是有意编造的,传说则是远古以来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都是神话。而炎黄、尧舜禹的故事,则是传说。传说可能把传说人物过分夸大了,但仍然是人而不是神^[2]。

神与人有一个重要区别，神是不死的，人是有死的。传说中的尧舜禹以及炎帝黄帝都是有死的，都是人而非神，这应该还是比较明确的^[3]。

著名秦史专家林剑鸣先生说：

神农氏，作为古代传说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但是，正如赫胥黎所说的：“古代的传说如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像梦一样平凡地消逝了，但奇怪的是，这种像梦一样的往往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预示着真实。”（《类人猿的自然史》）所以，像神农氏这样久远、古老的传说背后，一定隐蔽、孕蕴着远古时代大量的、真实的历史^[4]。

除上面所引用外，王国维、钱穆、张荫麟、李学勤等著名学者也都有过这方面的论述。王国维先生说：上古“传说之中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5]。李学勤先生说：“炎黄二帝及其后裔的种种传说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6]又说：“世界上任何古代民族，其古史总是富于神话色彩，甚至人神不分的。平心而论，中国传说的神秘意味是最淡薄的了。”^[7]

从这些论述看，传说人物（故事）和神话人物（故事）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是“史传”“史实为之素地”“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预示着真实”，后者是“有意编造”“所叙者，是神或半神的超人所行之事”。归结到一点，用俗话说，传说人物有生有死；神话人物无生，也是永远不死的。

我们依此理论说女登是一位传说性历史人物，而非神话人物，原因有三：

其一，从文献记载看。《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这句话表明，炎帝的父族为少典氏，母族为有蟠氏。炎帝当时所处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后期，是以氏族为单位，还没有完全进入以家庭为单位，实行的是对偶婚，即走婚制。就是说一个男子既有主妻，也不排除还与其他女性发生关系；反之，女子也是一样。所以，生下的孩子是生长在舅舅家，“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在上引的话里，未说明炎帝之母是谁。

《竹书记年》前编“炎帝神农氏”：“少典之君，娶于有蟠氏之女，曰安登，生神农。”《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

姜姓也。母曰任姒（《册府元龟》作“任已”），有蟠氏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皇甫谧在《帝王世纪》里又说：“炎帝神农，母曰任姒，有蟠氏女，有女登，少典妃。游华阳，有龙首感之，生神农于裳（常）羊山。”

上面三段文字中，前者说炎帝之母是“安登”；后两段中，一说是女“登”，一说是“任姒”。对此，已有学者认为这三个名字实指一个人，即“女登”。何为女登？“登”，《说文》曰“上车也。从、豆，像登车形。”段玉裁注：“引伸之，凡上升曰登。”为此，可以引伸为攀登、攀援之意。说明这个名叫女“登”的炎帝之母，是个善于攀登的女子，这也符合当时生民主要以采摘果实为生的情景，因为要采摘果实，必然要经常攀登树木。从这三段话和女登名字的含义看，并不含有神话色彩，是一种客观状况的描述，“预示着真实”。至于其中提到的“感生”，这是当时人们对女性孕育生产不能科学认识的一种反映。这种“感生”说也表现在其他原始人物身上，可以说是当时一种普遍的认识现象。如黄帝的诞生，《竹书记年》（卷上）记载：“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商人始祖契的诞生，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秦人先祖的诞生，也与此相类似：“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史记·秦本纪》）。又如，周人先祖后稷（弃）的诞生，是“其母有邠氏女……姜原初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史记·周本纪》）。这种“感生”说，正是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情形的真实写照，是与“女娲抟土造人”完全不一样的说法。当然，也有以炫耀出生之奇异、显赫的，如刘邦的出生，《史记·高祖本纪》说，其母“梦与神遇”，“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其二，从民间传说中的女登事迹看。关于女登的事迹，在古代文献里，仅有“感生”炎帝这一点，其他的事迹在文献中没有记载。实际上，古代的文献记载也是从传说得来的，只不过经过了当时学者们的筛选、加工而已。在宝鸡凤翔一带的民

间传说中,关于女登事迹的传说很多,如发明养蜂、草鞋、围裙、接生、游艺以及改制婚姻、抚养炎帝等。女登这些发明创造与炎帝发明的耒耜、五谷、陶器、医药、衣裳、音乐一样,都是当时先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东西,看不出是“有意编造”的,“是神或半神的超人所行之事”。很明显,这是一代又一代人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

其三,从“已知”推“未知”。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炎帝、黄帝一类人物是历史人物,即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是“真有其事其人”。当然,这个具体的“人”,不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具体的人。他具有多重含义,他既是一个具体人(首领)的名号,也是他所在氏族或部落的名号,还具有时代、文化等象征的意义。既然我们承认炎帝为传说性历史人物,真有其人,那么,作为炎帝之母,自然也就是传说性的历史人物,不可能是神,也就不是什么神话人物。因而,上面所引《竹书纪年》《帝王世纪》所说的女登“感生”炎帝是有历史的“素地”,而不是“有意编造”或荒诞不经之事。

另外,从少典氏、有蟠氏这种称呼,也可推知女登是人而非神。文献传说,炎帝的父族是少典氏。少典是古代中原古老氏族的首领,世代沿袭此号。这个氏族以“熊”为图腾,故称有熊氏。传说其氏族兴起于前仰韶文化时期,是三皇之一的太昊伏羲氏、女媧氏夫妇之子建立的。天水《伏羲庙残碑》有“东迁少典君于颍项,以奉伏羲之祀”的记载。《国语·晋语四》说,以前少典氏族中的一位男子娶有蟠氏族的一位女子(姪姪)为妻,生下了黄帝和炎帝。《史记·五帝本纪》及《集解》《索隐》《正义》中也都说到黄帝是有熊国君,为少典国君之子,其号曰有熊氏。其氏族部落处在伏羲、女媧时期或稍后,部落中心活动区域在今河南洛阳至开封之间。在今郑州市区一带,人口较为密集。少典氏又写作“小典氏”,说明其前必有大典氏或太典氏,因事迹不多而失载了。有学者研究后认为,从“典”字看,它与册字形象相似。“典”似乎是以竹册、木牍串在一起的简片,置于祭台上,供祭祀的首长们查看本氏族人员情况和记载祭神过程,所以有人说少典氏可能是最早发明文字的人。仓颉发明文字,是刻在陶器或者崖壁上,而少典氏发明文字则是刻在竹片或木片上,用藤葛串连起来保存,时间上比苍

颉更早。河南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也有人认为是距今7800至9000年间)的一批契刻符号。当时的符号刻在龟甲、骨器和石器上,有的契刻符号与商代殷墟甲骨文的某些字形相似,可见,少典氏族应与创造发明最早的“文字”有关系^{[8][50]}。

关于有蟠氏,有研究者认为,有蟠氏是以蜜蜂幼虫为图腾(一说为野蚕或蛇)的氏族部落,故被称为有蟠氏。其居住在伊洛河(今河南洛阳)至华山(今陕西华阴)一带(另有一说:“有蟠氏应属东夷族,居于山东境内无疑。”^[9]),善于养蜂采蜜。其氏族中有一支西迁,进入今陕西宝鸡渭河流域,先后与迁入上邽(今甘肃天水)的少典氏族部落通婚,繁衍出了炎帝、黄帝部落。有文献说,有蟠氏女安登,在“华阳”游历,于常羊感神龙首而怀孕,生下神子——炎帝。炎帝“人面龙颜”,善于耕种,所以,人们称他为神农。(皇甫谧《帝王世纪》)有蟠氏的一支又曾迁入北洛水(今陕北沮河流域),遂将居处的山脉称为乔(桥)山。后来,活动在桥山的黄帝部落的一支西迁或东迁时,又将桥山之名带到各地,这样,西海(今青海省青海湖)有“桥山”之名(今称“日月山”),涿鹿(一说在今河北怀来县,一说在涿鹿县)也有“桥山之名”。

有蟠氏属于前仰韶文化时期,其后裔延续了二几千年,迁居地广泛,文化遗存较多。河南西部的洛阳、孟津、渑池、嵩县、卢氏等地距今8000年的裴李岗类型遗址,其延续的文化应是有蟠和少典部落的文化遗存;陕西渭水流域的老官台类型遗址,如渭南北刘、临潼白家、华县老官台等距今7300至8000年的遗址,以及宝鸡关桃园(距今8000年)、北首岭下层(距今7100年)遗址等,则可能与有蟠和西迁的少典支族有一定的关系(包含华胥、燧人、女媧等裔支族)。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在关中渭河流域及其支流,在秦岭以南的汉水上游(今陕西汉中和安康一带)亦有分布。

有蟠氏部落沿渭水流域西迁及北徙,使北洛水的乔(桥)山,即渭河中上游有了其裔族的分布。在这个区域内自然还有少典族及华胥氏等裔族。渭水流域的今宝鸡市区在前仰韶文化阶段为何氏族居住呢?通过对北首岭遗址下层(属于老官台文化类型,距今7000至7300年)的分析,其文

化遗存的主人，应是早于炎帝氏族的有蟠氏部落裔支族^{[8]52}。

既然少典、有蟠为历史存在之氏族或部落，那么，作为有蟠氏之女——女登，也就不是什么神话人物了。

（二）女登与九天玄（玄）女无涉

有学者认为女登是九天玄女^[10]，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知道，九天玄女也叫“元女”“玄女”，或“九天娘娘”，她是道教所信奉的至高女神之一，被民间视为女性的高尚典范，视为感应神通的女性天神。关于她的故事，目前所知最早述及玄女的文献是汉代纬书《龙鱼河图》。其书载：黄帝时，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和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于是，黄帝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凡，授黄帝六壬、遁甲、图策、印、剑等兵信神符，制伏蚩尤。此处玄女是上天之神。《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将玄女视为商人始祖。因而，在《云笈七签·九天玄女传》中，玄女的形象被描绘成“人头鸟身”。九天玄女这一形象，还大量出现在《三遂平妖传》《水浒传》《女仙外史》等古典小说中，这些作品将九天玄女描写成“雍容华贵，兵法绝伦”的女神，其既能扶危济弱、铲奸除恶，又能往来于天上与人间。

两相比较，女登与九天玄女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形象。一个是无所不能、上天入地的具有神性的神话人物，一个是有发明创造、有生有死的具有人性的传说历史人物。二者风马牛不相及。之所以有人将二者等同起来，其主要原因是记载女登这位女始祖的材料太少，为了丰富其形象，人们便将神话人物九天玄女附会于女登。当然，可能还有一种原因，那就是一般人既不了解九天玄女，也不了解女登，所以将二者混同在一起。其实，不仅在民间，即使在一些传世文献中，也有人都会将二者相混淆。

（三）女登所处时代之蠡测

关于女登所处的时代，在文献中没有记载，我们只能依据少典、有蟠等氏族和炎帝所处时代情况进行推断。

从前文我们知道，女登是有蟠氏族的女儿，是炎帝之母。炎帝的生活时代，现在虽有多种说法，

但多数学者认为，炎黄时代与考古学文化中的仰韶文化时代相对应，大约距今 5000 至 7000 年。炎帝略早于黄帝，炎帝时代大约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早期，距今约 5500 至 7000 年。黄帝时期为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大约距今 5000 至 6500 年。那么，炎帝之母女登所在氏族有蟠氏时代就可能与炎帝生活的时代基本相同或略早于炎帝时代，大约距今 7000 年，其属于前仰韶文化或仰韶文化的早期。这里可以宝鸡北首岭下层文化（前仰韶文化）和宝鸡关桃园遗址文化与之相对应。有学者认为：宝鸡北首岭是有“代表性的‘炎帝祖先学’”^[11]研究对象，这就是说，宝鸡北首岭下层遗址文化的主人有可能是炎帝的祖先族有蟠氏部落。当然，这不是说宝鸡北首岭下层遗址就属于有蟠氏部落，但女登有可能就生活在此期间。

宝鸡北首岭遗址分为上中下三层，时限距今为 5700 至 7100 年，大概延续了 1400 多年。上中两层遗址属仰韶文化时期，下层遗址属前仰韶文化时期。从出土文物看，丰富的生产、生活工具，反映了这一时期农耕文化的先进状况，表明这里的人们开始过上了定居生活。从社会形态来说，此一时期正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期，并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而这个时期，正好与民间传说的女登时期相近，我国的蜂业也出现于农耕时期。其他传说如女登所发明的围裙、蓑衣等，从宝鸡北首岭出土的陶纺轮、陶器上的席纹推测，也是有可能存在的。

二 女登文化的考察

女登文化在古代文献里很少涉及，但在民间却有比较多的流传，这些传说故事多集中在今陕西宝鸡凤翔槐原、陈仓区桥镇一带。

（一）女登文化民俗

传说女登去世后，葬在了桥镇。当地群众在这里建有安登（女登）亭、安登庙，每年农历三月三举办庙会，以祭祀女登。将女登传说归纳起来，其主要事迹有发明养蜂、草鞋、“遮腰”（围裙）、接生、游艺以及改制婚俗、孝道等。笔者主要就其发明养蜂、草鞋，改制婚俗、孝道进行考察。

发明养蜂。传说，女登所在有蟠氏族原生活于渭河南岸、秦岭北麓一带，每年春季利用秦岭山上的花草养蜂。炎帝发明了刀耕火种，在秦岭北麓一

带烧荒耕种。这不仅毁坏了花草,也烧死了蜜蜂。于是,女登渡过渭河,将蜜蜂赶到今凤翔槐原一带。槐原地处塬上,气候温和,而且有生长茂密的槐树。每到农历六七月,槐花盛开,正是蜜蜂采蜜的季节。于是,女登便在这里居住下来养蜂,所以民间称其为“中华蜂业之祖”“中华养蜂第一人”。尽管女登养蜂只是一个传说,但这种传说正好与有蟪氏族以“蟪”为图腾相吻合。今人研究,蟪,是指一种蜜蜂的幼虫,这也说明有蟪氏族是一个以养蜂为业的族群,女登就是其代表人物。这则故事的后面,隐藏着中华蜂业起源的线索。

中国的人工养蜂,根据文献记载最早出现于2000多年前。《诗经·周颂·小毖》说,“莫予荇蜂”;其后的《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六经》始有“蜂蜜”双音词,一直沿用至今。但如果要追溯养蜂的最早起源,则可追溯至人工采集天然蜂窝时代。原始社会时期,蜜蜂处于天然状态,岩穴、树洞是天然蜂窝。人类以采集天然植物和渔猎为生,自然野生蜂巢也就成为采集对象。最初,先民以捣毁蜂窝、火烧成蜂的方式掠食蜂蜜、蜂子。其后人们逐渐改变了“既毁我室,又取我子”的原始掠夺式的采集方法,而有意识地利用蜂群的再生产能力,采取用烟驱蜂、保留蜂窝的方式,索取蜂蜡、蜂子。这样,采集蜂蜜开始由天然采集过渡到了人工养蜂阶段^[12]。前面所说的女登养蜂时期,可能就是处在天然的采集蜂蜜阶段。

发明草鞋、“遮腰(围裙)”和“蓑衣”。原始时期,先民没有衣裳,只能用兽皮、树叶遮风御寒。传说有一天,女登同族民一块儿上山采果觅食,一不小心,脚被树枝划伤了,流血不止。女登随手扯了把藤条缠在受伤处,血止住了。女登受此启发,就按照脚的大小,用藤条编了双草鞋,穿在脚上,这样走起路来舒服多了。一传十,十传百,族民们在她的教导下,也都穿起了草鞋。女登又用马莲草,编了一件草“蓑衣”,围在腰间,既遮丑又护腰,还可披在身上,遮风挡雨。据说,今天,厨师做饭胸前的围裙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无独有偶,类似于女登发明草鞋的故事还有另一种传说。古时候有个老汉叫张果老,以打柴为生。由于赤脚上山,双脚经常被树枝、石子扎得鲜血淋漓。他日思夜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稻草做鞋。开始,他用一束稻草裹脚,但散乱的稻

草容易断,走起路来也很不方便;后来他把稻草搓成筷子般粗细的绳子,一根一根地缠在脚上。这样虽好一些,但缠脚和脱掉都很费时间。后来他又想出一个办法,把稻草编成有底有面的草鞋^{[13][12]}。

这两则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人的草鞋都是在生产劳动中受到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这符合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这两则故事的内核具有其真实性。

根据有关专家研究,中国人的鞋子最初是原始的“裹脚皮”,即用兽皮裹脚。大概距今7000年前后,产生了草鞋。考古发现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苇编席子。以此推测,先民自此开始用植物的根茎为原料编织穿戴用品。从用兽皮裹足发展为草编鞋,这是鞋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13][12]}。当然,从目前研究来看,关于鞋的产生还有不同的观点。有说北方是由跣足发展为兽皮裹足,南方是从跣足发展为植物编鞋,但不论说法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兽皮裹足要比草编鞋履早得多。这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因为用来裹足的兽皮只需石器就能完成简单的切割,而编织草鞋则需要具备一定的技艺和更复杂的工具。”^{[13][12]}随着葛麻的出现,麻鞋代替了草鞋,麻衣代替了兽皮、树叶。文献记载,炎帝时代,织麻为布,产生了衣裳。《淮南子·汜论训》云:“綖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联系女登发明草鞋的故事,女登所处时代正好是距今7000年前后,所以,民间传说女登发明草鞋的故事是有其历史依据的,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改制婚俗。传说女登所处时代之前是群婚,大家不分男女,不分年龄和族别、辈分,任意婚配,以致生出了许多不健全的人。女登被族民推选为有蟪氏首领后,提倡与外族婚配,按年龄找配偶,禁止上下辈和兄弟姐妹之间结合。为了相互寻找方便,外族男子到有蟪氏族来找对象时,手拿一根火柴头。男方在前面走,女方选择到适合自己年龄的男性,就自愿跟随他走。男方见有女子跟来,称心者,就选择婚配地点,但互不说话。这种婚配方式,俗称“野合”。这种遗俗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前后。当然后来的“野合”,已不是原始意义上的婚配形式。

文献记载伏羲发明了族外婚,产生了男娶女嫁

的制度。实际上，伏羲处于渔猎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早期，当时婚姻制度还是一种群婚制。这种婚姻关系与之前的杂婚不同，已排除了上下辈的婚姻关系，但不排除同辈即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关系，伏羲、女娲兄妹结合的传说就是一例。所以在那个时代，还不可能有男婚女嫁的情况出现。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婚姻形式才从群婚过渡到对偶婚，并逐渐演变为后来的嫁娶婚姻，即男娶女嫁。黄帝时代处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稍晚时期，即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其社会形态已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化时期或父系氏族社会的初期。也就是说，有些氏族部落可能已进入了父系社会，有些氏族部落还正处于转变阶段。反映在婚姻制度上，其可能处在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转变或已部分地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现象时期。对偶婚，就是说“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丈夫”^[14]。在这种婚姻关系或一夫一妻制下，才有可能产生嫁娶制婚姻。《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是黄帝正妃。”这条记载反映了黄帝时代男娶女嫁的婚姻状况。女登时代虽稍早于黄帝时代，但二者都处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所以，传说女登改制婚俗也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

炎帝“寻母”“抬母”的传说。女登随着蜂群迁徙凤翔槐原以后，炎帝寻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母亲下落。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看到一群一群的蜜蜂向渭河对岸的塬上飞去。因每到农历六七月，秦岭山区的花期已过，而北塬上槐原一带槐花盛开，正是蜜蜂采蜜的时节。于是，炎帝就跟随蜂群来到槐原，找到了母亲。炎帝让母亲跟随他回到渭河南的原住处，以便侍奉她，但母亲考虑若离开这里，蜜蜂就会无人放养，便婉言谢绝了儿子的好意。从此以后，炎帝便于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六日，带上族民来到凤翔槐原村看望母亲。为了让母亲高兴，炎帝做了副形似轿子的担架，让母亲坐上去，抬上母亲在村子周围转几圈，游一游，让母亲高兴高兴，算尽了孝心。岁月流逝，这种轿子便慢慢演变成为今天的山社火。村民为了纪念这位发明养蜂的女始祖，便在村里修了座女登庙，于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六日举行庙会，这种习俗传承

至今。每到庙会期间，村民都要自发地去游演山社火，唱大戏，缅怀炎帝之母女登。

上面所述几则故事，反映了女登具有创造、利民、厚德等多种精神品格。这些精神品格，不仅是女登其人的精神，也是女登所在氏族即有蟠氏族的精神。这些精神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本来，民族精神就是众多个体、族群、集团的精神经过长期积淀、升华的结果。

（二）女登祭祀

女登祭祀在凤翔槐原村流传悠久，其主要形式是每年一次的庙会。何时建女登庙，地方志书和文献都没有记载。1995年在庙内出土的一块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石碑，其碑文中记载了重修九天圣母庙的情况。碑文说：“一则立庙唐时，一则著迹宋代，具非无稽者。此旧庙渐旧驳损，嘉庆十三年，阖村共议重修，于是……焕然一新。”^[15]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女登庙有可能修建于唐代，但碑文中将此庙说成是九天玄女庙不准确。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将九天玄女与女登混淆起来。彼时，九天玄女被尊奉为道教至高女神，而女登被遮蔽了。

在女登祭祀活动中，除传统节日和庙会期间善男信女们烧香化纸跪拜外，流传至今的主要有三大民俗祭祀活动：唱大戏、游演山社火和挑排灯。这里主要介绍后两种：游演山社火和挑牌灯。

山社火的起源，传说与炎帝“抬母”巡游有关。经过不断的演变，游演山社火至今已成为一种祭祀炎帝、女登的盛大游艺活动。每当女登庙会正会那一天，都要游演山社火。所谓山社火，其形状像“大山”一样，高两丈有余，分三层，每层由大车轮做支架，便于转动，并用各种色布围拢；每层站立十多人，妆扮成各种角色。因山社火形体庞大，游演起来需要成百上千人参与，所以，此活动显得特别的热闹。因山社火制作复杂，参与人员多，所以，这种活动只在特别节日和年份演出^[16]。

排灯会的起源，传说也与炎帝和女登有关。对于凤翔槐原人来说，春节过后，临近庙会期间，家家户户就忙起来了，尤其是妇女，她们要开始制作排灯了。所谓排灯，是在一米长短的木干顶端，装一个方形木制盒子，四周糊上窗花，里面点上一根蜡烛。挑上排成一行，就成为排灯。到

了庙会正会(农历正月二十六日)的前一晚,晚上6点过后,从各家各户,陆续走出挑着排灯的男女老少,由点到线,沿着乡间小路,渐渐地自觉汇聚成多条“火龙”,蜿蜒行进,向坐落在村子的女登庙走来。随着夜幕降临,只见条条“火龙”蠕动,不见挑灯人身影,煞是好看。放在旧时,各路“火龙”为了争抢烧头香,往往你拥我挤,甚至相互动手打斗。现在有庙会会首组织,大家先来后到,有序向女登塑像祭拜,上布施、放鞭炮、献供品、上香烧纸、叩头作揖,活动延续到深夜十一二点,蜡尽灯灭,方才散去。

排灯会既是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也是一种祭祀礼仪形式。为什么要用排灯这种祭祀形式,据说与火有关。火又与炎帝有关,炎帝“因火师而火名”。炎帝与女登是母子关系,所以挑排灯就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并成为祭祀炎帝、女登的一种重要祭祀礼仪形式。再说,在挑排灯的行进过程中形成的数条形似“火龙”的长阵,也与炎帝有关。炎帝因其母感“神龙首”(《帝王世纪》)而生,自然为“龙子”,为有桥氏的后裔,是龙的传人。所以,挑排灯这种民俗文化也就成为女登文化、姜炎文化的组成部分。排灯队伍汇集女登庙,以排灯敬奉、祭拜女登,这反映出人们对女登这位中华民族女始祖的崇敬。

挑排灯这种民俗活动的内涵和特点,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惟一性。这种以挑灯成排的活动形式,除了凤翔槐原村有这一民俗事象外,陕西乃至全国各地绝无仅有。正因为它的唯一性,才每年吸引周边县区数万人前来观看。彼时,游客们将凤翔槐原这座偌大的村庄围得水泄不通。

二是群众性。这种民俗文化活动的群众性表现在各家各户、男女老少齐上阵。他们既是排灯的制作者,又是表演者,还是观赏者。

三是自发性。各家参与挑排灯活动,不需要组织、摊派,村民自觉自愿参与,大家以能参与这一活动而感到光荣、自豪。

四是悠久性。正因为这一活动的群众性、自发性,其才有悠久的生命力。即使是遇到天灾人祸的年头,这项活动也没有断绝过。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项活动被当作所谓“四旧”被破除,停止了一段时间,但“文化大革命”一结束,这一古

老的民俗文化活动便“死灰复燃”,焕发出新的活力。

五是游艺性。这一民俗事象,看起来古朴而简单,但在这看似简单的活动里,“游”“艺”“动”“静”完美、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灯盒四周糊的窗花或绘画,既有人物,又有花鸟;既有神话传说,也有历史故事。在这林林总总、内容丰富的窗花和绘画里,蕴涵着庄稼人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希冀,正是这种憧憬和希冀支撑着他们将这一民俗世代地传承下来。

(三)女登文化的开发与利用

文化不仅是城市的灵魂,也是乡村的灵魂,正如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所指出的那样:“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乡村文化的建设,必须立足于本地本村文化。每个乡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生活于这种氛围和环境中的村民,既是本乡本村文化、文明的创造者,也是本乡本村文化、文明的受益者。他们之间具有天然的文脉、文缘关系。这种文脉、文缘就成为剪不断的乡愁。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吸收城市文明及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所以,我们要立足本乡本村文化,“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才能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17]

女登是炎帝之母,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凤翔槐原是女登故里,是女登文化的发祥地。民间传说,女登是中国养蜂第一人,发明了原始蜂业,创造了原始蜂业文化;发明了草鞋、蓑衣和“遮腰”,解决了族民的穿鞋、避雨等问题;养育了中华民族伟大始祖——炎帝。女登所创造的女登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祖根文化、源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它不仅是姜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炎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女登身上所体现出的创新、利民、厚德精神,至今还有其借鉴和启示意义。

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当地热心乡贤

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成立了“女登文化研究会”，相继召开了几次小型研讨会、座谈会，举办了几次祭祀女登活动，也出版了二三本介绍、研究女登和女登文化的书籍，但总的看来，女登和女登文化的研究、祭祀等活动，还未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和参与，还处在“自生自灭”“半死不活”的尴尬境地。

为了充分挖掘这一优秀文化遗产，充分利用这一优秀文化传统来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笔者提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建议：

(1) 恢复女登祠，还女登祠以原本用途。自古以来，庙宇、祠堂是乡村政治、文化中心。乡村中各种活动，尤其是传统节日活动，大都是在当地的庙宇、祠堂进行的。每年一度的庙会，更是乡村各种文化展示的平台。据方志记载，旧时的乡村，几乎村村都建有自己的庙宇、祠堂。据碑文记载，凤翔槐原女登祠建于唐代，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直作为槐原村及周围村民敬奉女登的场所而存在，在凤翔当地享有崇高的地位。其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六日作为女登祠庙会日，吸引了众多周边民众前来烧香祭拜，女登祠庙会成为每年一次的盛大集会。女登祠庙会何以能够千年传承，是因为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感恩还原、娱神娱人、祈福祛邪、求子求财、健身健心、教化传承、敦亲睦邻、交际交流等^[18]。但从目前的女登祠看，一是挪作他用，成为一处“道观”，敬奉的是九天玄女；二是因年久失修，祠院狭小，殿宇简陋，与女登的崇高地位极不相称，严重影响了女登形象和女登祠的声誉。建议有关方面根据广大民众的信仰意愿，还女登祠以本来用途和功能，使其成为当地群众真正意义上祭拜始祖女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场所和平台。

(2) 大力保护、开发女登文化，发展乡村特色旅游。悠久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凤翔槐原女登文化。这不仅反映在流传至今的女登故事上，而且体现在与女登有关的排灯、山社火等民俗文化方面。这些颇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不仅在当地有很大影响，而且在日本等周边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据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民从报纸上看到排灯会报道后，专程来到凤翔槐原，观赏、研究、了解这一民俗文化。为此，建议槐原村委

会重视保护、开发女登文化和排灯民俗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发掘其中蕴藏的新的意义和价值，使其为乡村文明建设服务，为培育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同时，建议有关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女登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加大投资力度，在完善女登祠现有设施的同时，恢复女登祠原有的庙院，修建女登文化广场，塑造女登像，大力开发女登庙会文化和排灯、山社火等民俗文化，发展乡村特色旅游。

(3) 广种槐树，以槐树为“村树”，建设生态槐原新农村。槐树别名“国槐”，俗名“土槐”“老槐”，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树木，距今已有上万年的历史，在《周礼》《本草纲目》等古籍中多有记载。槐树具有经济、药用、人文等多种价值，《春秋·元命苞》云：“槐之言归也。古者树槐，听讼其下，使情归实也。”在古人看来槐树是决断讼狱、公开公正之象征，饱含“怀念家国”之寓意。我国古时农村多有在村口或门前栽种槐树的习俗，以预示游子“魂归故里”之意。槐原村以“槐”取名，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槐原村不仅传说是女登创始中国蜂业的始发之地，而且是槐文化的象征之地。为此，建议街区巷院，广植槐树。广植槐树，一是美化村容村貌，净化居住环境，提高村民生活质量；二是增加特色旅游项目。在百花凋谢的夏季，正是槐花盛开之时，通过举办“槐花节”，可以吸引四方游客来此观树赏花。另外，还要大力发展蜂业，以增加农民收入。

(4) 弘扬孝德文化，提高村民精神文明素质。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弘扬孝德文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女登的传说故事里，有一则炎帝每年于母亲女登诞辰日——农历正月二十六日，从秦岭山脚下来到槐原“制轿抬母游”的故事。这则故事虽简单、质朴，但在简单质朴中却含有深刻寓意，反映了炎帝的孝德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应该通过弘扬炎帝孝德精神，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提高农民的精神文明素质。

(5) 加强研究、宣传、普及女登文化，打造槐原文化名片。受到主客观因素影响，女登文化研究会虽已成立了20多年，但其在女登文化研究方面还未取得突破性成果，也未引起学术界的广

泛关注。研究是基础,建议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与槐原村村委会和女登文化研究会通力合作,以举办研讨会、编制课题等形式,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展女登文化以及与女登文化有关的炎黄文化、民俗文化、乡贤文化等研究,编辑出版论文集、故事集。在当地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适当的时机,召开较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在大力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多种媒体,广泛宣传女登文化和排灯、山社火等民俗文化;通过出版图书画册,拍摄影视,建立村史馆;通过举办讲座、女登庙会、女登艺术节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女登文化和女登精神。在当地学校,可以女登文化为内容,编写乡土教材,向中小学生普及女登文化、女登精神和民俗文化的有关知识。通过以上系列活动,将女登文化打造成为凤翔槐原一张文化名片,并将这张文化名片逐步推向全县、全省、全国及海外。

另外,建议当地政府部门在已将《女登的故事》列入县、市级“非遗”名录的基础上,继续将女登祭祀和排灯会申报为省级和国家级“非遗”项目。

通过考察,笔者认为,女登是位传说性历史人物。她大约生活于前仰韶文化或仰韶文化的早期;她是有蟠氏之女,与少典族通婚。传说女登感“神龙首”而生炎帝,她是中华民族的女始祖,也是中华蜂业之祖、中华养蜂第一人。她先生活于宝鸡秦岭北麓,后因养蜂而迁徙于今宝鸡凤翔槐原村一带,传说去世后葬于今陈仓桥镇。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其“子”炎帝去世后,葬于“茶乡之尾”,即今湖南炎陵县洣水河之畔的白鹿原。女登所创造的女登文化,内涵丰富。传说她不仅发明了蜂蜜、草鞋、蓑衣、围裙,还改进了原始婚俗,使原始婚俗由群婚进入对偶婚,为后来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打下了基础。传说中炎帝“寻母”“抬母”的故事,体现了炎帝的原始孝道精神,为中华孝道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女登祭祀是女登文化的重要内容。碑文记载,槐原自唐代始建女登祠以来,以排灯会、抬山社火等民俗礼仪形式祭祀女登,至今绵延不绝。这种排灯会具有唯一性、群众性、自发性、悠久性、游艺性等特点。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应保护、开发和利用女登文化这一独特文化资源,打造具有特色的乡

村旅游文化。笔者认为,加强研究、宣传、普及女登文化,扩建女登祠,举办女登祭祀典礼和女登文化艺术节,发展寻根祭祖旅游,对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高乡村社会文明水平,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茅盾.神话研究[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3-4.
- [2] 张岱年.炎帝黄帝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J].炎黄文化研究,1994,1(1):28.
- [3] 张岱年.炎黄传说与民族精神[M]//王俊义,黄爱平.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8.
- [4] 景明.神农氏炎帝·序[M]//景明.神农氏炎帝.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2.
- [5] 王国维.古史新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2.
- [6] 李学勤.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M]//李学勤.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50.
- [7] 景明.神农氏炎帝·跋[M]//景明.神农氏炎帝.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262.
- [8] 霍彦儒.炎帝故里[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4.
- [9] 刘宝山.黄河流域史前考古与传说时代[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65.
- [10] 鲁旭,邵潇玮.九天元女考[J].宝鸡社会科学,1998(4).
- [11] 文怀沙,邵盈午.中华根与本:宝学概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2.
- [12] 佚名.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养蜂卷[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
- [13] 骆崇骥.中国历代鞋履研究和鉴赏[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
- [15] 佚名.《槐原》九天圣母重修碑文[G]//凤翔女登文化研究会,宝鸡与周秦文化研究会.女登与槐原.鲁旭,摘抄,点校.岐山:陕西省岐山彩色印刷厂,2016:105.
- [16] 鲁旭.凤翔民俗:下[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587.
- [1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2020-12-01].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 [18] 侯仰军.村落庙会何以能够传承千年[N].光明日报,2018-04-28(12).

责任编辑:黄声波